

求真: 科举学的科学品格*

殷小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求真是科举研究超升为科举学的原始驱动力, 也是年轻的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必须坚守的品格。为了求真, 研究者首要的任务是为科举制正名, 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在求真的过程中, 要坚守“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抱有对历史“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 坚持“多元与会通”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 求真; 科举制; 科举学; 科学品格

中图分类号: D6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06)05-0076-04

科举制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古代的考试取士制度, 存在的历史达一千三百年之久。千余年来, 人们对它的研究从未间断; 但是, 将科举研究汇聚成“科举学”则不过是近十来年的事^{[1](P89-95)}。如果说1992年刘海峰教授始倡“科举学”只是呼之欲出、初露端倪的话, 那么到2005年随着刘海峰教授《科举学导论》的问世和《科举学导论》课程的开设, “科举学”可以说是正式诞生了。而在科举研究汇聚成“科举学”的过程中, 求“真”是其原始驱动力。因为, 一门关于历史制度的学科的形成, 首要解决的是人与历史的认知关系, 而人与历史的认知关系, 即“真”, 主要表现在对于历史事实的认识和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2](P82)}。也就是说, 科举研究要成为科举学, 就必须既具有如实反映历史真相, 又具有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品格。而对这种科学品格的诉求, 正是科举研究者倡导建立科举学的旨趣所在, 也是科举学逐步得到人们认同的原因所在。可以说, 求真是科举学的科学品格; 年轻的科举学要在21世纪发展成为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就应该坚守求真的科学品格。

一、求真的旨趣: 为科举制正名

认识历史的事实和历史的规律,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历史常常被蒙上重重叠叠的迷雾, 历史著述往往受到各种传统偏见的影响。对科举制的认知、诠释和反思亦然。为此, 在科举研究中首要

的任务是为科举制正名,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进而认识其客观规律。其中, 要注意纠正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丑化、妖魔化科举制, 另一种是美化科举制。两种倾向中以妖魔化科举制为重。

首先, 要纠正对科举制的随意丑化和妖魔化。可以说, 从清末以来, 特别是1905年科举废止后, 科举制几乎成为“腐朽落后”的代名词。谴责八股科举的宏文车载斗量, 以小说《儒林外史》和《聊斋》中的有关短篇影响最大, 以康、梁的论八股最沉痛最激切。他们把知识分子人格的变态、吏治的腐败和“中国之割地败兵”, 统统归咎于八股科举。到本世纪初, 八股科举甚至被唾骂为与缠足、鸦片和纳妾一样的腐朽落后的东西, 是“人类所发明的最恶劣的知识枷锁”, “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 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种制度。批判者们都认为科举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上作了大孽, 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 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不仅不能选拔和造就人才, 而且败坏人才, “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 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 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 “从未以支持完整自由的人格发展为目的”^{[3](P15)}, 危害比焚书坑儒还要大。久而久之, 在大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 科举都是被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加以介绍的; 在大学文科教学中, 科举也通常以负面的形象出现;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一沾科举便无足观”。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

* 收稿日期: 2006-05-29

作者简介: 殷小平(1977—), 男, 湖北黄冈市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科举考试研究。

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就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往在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形成了妖魔化、简单化的科举评价套路。这不是求“真”的做法，而是离“真”渐行渐远。

其次，要防止对科举制美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近二十年来的科举研究中逐渐兴起。一些科举研究者因日久生情而萌生“科举情结”，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美化科举的现象，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很难完全做到价值无涉；还有部分研究者经常引用外国人对科举制的赞扬，不加区分地把科举制视为珍宝，如把科举称为“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等。这种主要依靠外来者的眼光来观察自己，实际上是一种奴化心理，是一种自我文化殖民。从古到今，外国人对中国事、中国人的看法常常与实际不相吻合，由此产生的判断、决定，自然也鲜有恰当、到位的。英国诗人艾略特曾说：“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镜子是不透明的。这种不透明性既由于中国事务本身呈现出的复杂多面的暧昧性，也因为西方从来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描述中国，中国事务只是可供随意取舍的证据。西方始终把中国当作一个文化他者，一个参照物，对应根基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加以衡量、评价。具体到西人对科举的评价上来，之所以出现对科举的溢美之辞，是因为他们是科举考试的局外人，对其弊端无切肤之痛，看到的是科举制外表的优美与形式上的完善和平等，容易注意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合理性、进步性，忽略科举考试内容空疏、扼杀创造性等弊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科举研究中首要的任务是客观公允地认识、诠释和评价科举制，既不能妖魔化，也不可美化，既不虚美，也不隐恶。只有为科举制正名，还历史本来面目，科举学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二、求真的门径：科学的精神、态度和研究范式

科举学要坚守求真的科学品格，就离不开“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求是精神、“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和“多元与会通”的研究范式。

(一)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求是精神

前面提到，对科举制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与评价十分不易，这就需要研究者胸怀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这既是治学之道，也是安身立命之本。由于科举制在晚清受到全社会的鞭笞，所以进入民国以后，人们都讳言这种制度还有什么优点，当时“科举二字不符时俗耳目”，言科举者“足大来丑诋”。在全社会都在批判科举的大趋势下，少数对科举想作较客观研究的人甚至有点忌讳使用“科举”一词，而以“考试”代之，如1929年邓定人所著《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主要内容为科举考试史，实际上就是第一部研究科举的专著。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又由于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研究科举制的论著，揭露其弊病的多，做出些微肯定的几乎没有。几乎每一部中国通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制度史著作都会涉及科举，均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叙述的^{[4] (P56)}。令人欣慰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国内科举研究空前活跃起来，史学界、教育学界、政治学界和文学界的学者都发表了不少有关论著，科举研究的中心也回归到本土，而且此时期科举研究还出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趋向，并于1992年由刘海峰教授首次系统地提出“科举学”的概念，将科举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来看待。此后科举研究不断走向繁荣。百年回眸，对待科举制，始有世纪初之唾弃与冷淡，继有世纪中之清理与批判，后经世纪末之重视与反思，始创科举学，此间之沧桑巨变，宛如隔世。由是观之，不难看出，科举研究之所以能从简到繁，从粗糙到精细，从支离零散的研究变为一个日渐茂盛、枝叶扶疏的综合性专门研究领域，从一门当时的“险学”变为一门正在成长中的“显学”，既离不开社会进步和学术昌明之外部环境，也离不开那些真正的学者们心中恪守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的求是精神。

(二) “了解之同情”的科学态度

在科举研究中，除了要坚守“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科举也同样重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下面诸位学者的精辟论述值得借鉴。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学问乃千秋事，订伪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仿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上册审查报告》中指出：“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又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还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无独有偶，另一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特别提到：“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以及“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先生亦认为：“历史家必须具备一项基本条件：即能够重新设身处地去体会古人的思想。中国旧词中有所谓‘将你心，换我心，方知相忆深’之句，正是历史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希望达到一种‘同情的了解’的境地。研究思想史不是为了‘打倒’什么或‘拥护’什么。研究者不能用自己以为高深或正确的理论去笼罩古人。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古人，则一切古人都和我们所持的尺度不合。”^{[5](P342)}

由是观之，“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可为当前科举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性的提法。因为如果不了解古人著述的具体环境、相关背景、立说的用意和对象等情况，就不可能对古人的著述有真了解，也就不具有对古人的发言权。后人都应当持有一种客观的、无偏见的态度，既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有意制造疑点，也不可为解决疑点而对部分或整体的意义加以曲解，以便得到某种一致的解释。总之，如果我们以“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看待科举，就会发现“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作一个中性词来看待，不能继续走过去那种“礼失求诸野”、“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把污水中的婴儿一起泼掉”的历史虚无主义道路，将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一笔抹煞，而要走文化自觉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路，从科举制的经验教训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来滋养、完善并发展今天的考试制度。因为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

(三)“多元与会通”的研究范式

科举制历史悠久且内容广泛、包罗宏富，决定了科举学是一片广袤的、可供纵横捭阖上下驰骋的专门研究领域。这就要求在研究中采用多元与会通的范式。

首先，需要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多种研究路径。因为“治史有如看山”，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多视角的。欲识庐山真面目，必须与其保持距离，或横看、竖望，或远眺近观，或俯瞰仰视，然后才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科举亦应如此，切忌拘守单一观点，更不能画地为牢、各自为战、自我封闭，必须从多角度和不同侧面加以考察，然后庶几可以识得其真实面目。根据这种史学理念，既有总体考察，又有个案的研究，既追溯其历史又观测其现状，既评判其已有功过又探讨其未来发展。另外，身在山中固然难识其真面目，而未曾登临此山恐怕也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其全貌及内涵。对于历史，既要能入，又要能出，然后才庶几可以形成真知灼见。

实际上，已有的研究就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这种研究范式。例如，有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科举考试与学校书院之间取士与养士关系的；有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科举与统治秩序、政权结构的关系的；有从社会学出发研究科举和社会流动、科举社会与学历社会关系的；有从文学史的视角研究科举与文学、文体的关系的；有从文化学的视野来看科举与文化的关系的；有从人才学的角度研究科举与人才的关系的；还有从考试学的视角看科举考试与现代高考、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联系的。另外，既有做单一国别研究的，也有做中国与韩、越、日等国之间的比较研究的；既有从制度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传统视野研究科举的，也有从“国家-政策(制度)-社会”分析模式来考察科举运动的流程及变化的；既有研究静止不动的科举历史的，又有关注动态发展的考试现实的；既有做科举通史研究的，也有做断代科举研究的；既有做全国性的科举总体研究的，也有做分省分地的区域科举研究的；既有从区域文化入手的，也有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入手的；既有对科举的利弊

得失进行理论思辨的,又有大量的科举人物统计资料供实证分析的;既有专门精深的煌煌巨著,也有通俗浅显的普及性读物;既有影响面广泛的科举文物文化展,又有网上科举文化普及宣传;既有通过学术会议或专题笔谈的形式研究科举,又有通过开设专门课程的方式研讨科举。

其次,除了采取多学科的方法、多种表现方式外,还要强调会通,达到“多元与会通”的理想状态。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多学科的研究虽有利于研究细致入微,但却缺少交叉和综合,以往对科举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但由于不同学科在学术路向上的差异,直接造成了学术取向上的自适效应。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擅长的部分和熟悉的手法,作为科举研究的对象和基本方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各个学科多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单科作战,分散进行,缺少交流碰撞,很少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的综合研究领域来看待,科举研究无法产生独特性,也无法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存在着《庄子·天下篇》批评的那种可悲局面:“……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因此,我们既要不断丰富研究资源,又要在思维方式、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与方法等方面不断更新;既要研究历史上的科举,也要研究当前的考试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做到既鉴古知今,又要知今通古,以达古今会通;既要了解中国科举历史,也要了解东南亚其他国家科举历史,既要关注国内的科举研究成果,也要关注国外的研究成果,以求中外会通;既可

采取价值的、体验的和批判性的诠释方法,也可采取实证的、逻辑的和工具性的分析方法,要逐渐消除一百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具有极端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并在整体观照中建立起开放的、亦此亦彼的会通的思维方式;既要强调学科专门化,也要强调学科的对话、融合与会通。因为科举学是一门跨学科研究的综合性学问,其研究对象是单一学科、专业所无法包容的,“超越学科性的约制不能靠简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因为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些简单的多学科建议其实只会强化固有的学科界限”^{[6] (P19)}。“这种情形埋伏着一个危机。它将产生出限于一隅的思想,每一个专业都将进步,但它却只能在自己那一个角落里进步。”^{[7] (P188)}因此,科举研究不仅需要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还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把不同学科、不同国别、不同研究方法、不同表现方式所获致的对科举不同侧面和层面的认识,有机地组合起来,实现研究的“多元与会通”,才能使科举研究的各个层面得以汇聚和交融,以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进而把年轻的科举学推向更加开放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成熟阶段。

参考文献:

- [1] 刘海峰. “科举学”刍议[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2, (4).
- [2] 许苏民. 人文精神[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 [3] 杨齐福.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与批判[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
- [4] 刘海峰. “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 (4).
- [5] 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6] 华勒斯坦. 学科·知识·权力[M].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 [7] 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8.

Pursuits of Truth: the Scientific Character of the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YIN Xiaop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Pursuits of truth is the motive power to impel the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to become a discipline. To be a thriving discipline, the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hould keep the scientific character of pursuits of truth. Researchers should stick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only asking whether it is right or wrong and not caring about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ey should hold the academic attitude of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izing with the history” and insist on promot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way of “many facets and the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ubject”.

Key words: pursuits of truth;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cientific character

(责任编辑:周振新)